

日本编译《黄文弼著作集》记事

黄 烈

之一：

原 委

1994年10月，当我接到东京恒文社寄来日文版《黄文弼著作集》第二册《吐鲁番考古记》的样书时，不禁百感交集，如果说最初尚有一些欣慰，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沉重。拿出这一大本厚厚的书，一些有关学者的面容马上浮现眼前，他们中有些人却已辞世而去，连本书的译者也没有见到本书的出版。我有责任把这部书的原委作一番交代，为中日学术合作留下一笔资料，同时也是对逝者的怀念。

十年前，1984年8月，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教授致函夏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告知他们正在进行黄文弼先生全部考古著作的日译，请求协助，并请代购黄文弼著作原版书各二册。大家知道黄文弼先生的考古著作起于三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尚未全部出完，延续时间很长，市上早已绝迹，特别是早年著作更为难觅，要找齐很不容易。夏先生支持了这一工作，在考古所藏书找出二种寄赠。其后日本朋友从我这里和日本国内把工作用书找齐了。正当这一工作刚刚起步时，宫川先生突然在1984年12月逝世，距给夏先生来信仅4个月。夏鼐先生在相隔半年后也辞世而去。

宫川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都很有研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宫川先生首先着眼于黄文弼先生的新疆考古著作。黄先生的新疆考古对日本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但黄先生的中文著作只限于小范围流行，如果结集成系列翻译成日文，对于在更大范围普及当大有好处，这就是宫川先生首创这一工作的由来。《黄文弼著作集》的内容安排和出版顺序，宫川先生已大致拟出。后来即据之分为四大册，即第一册《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二册《吐鲁番考古记》（包括《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第三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四册《新疆考古记》。这对中国新疆考古学早期成果来说无疑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集结。我们的人力物力尚无暇及此，而由日本朋友来做是意味深长的。正如宫川先生所说，它的意义在于向日本介绍本世纪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宫川先生还计划在黄文弼著作日译本出版后，陆续日译向达等先生的著作。使世界学坛更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考察和研究的贡献。

作为文学大师的井上靖先生，与丝绸之路同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小说《楼兰》，在日本脍炙人口。井上靖先生曾与宫川寅雄先生五次同行来华访问，他说几乎每次宫川先生都要向他谈起黄文弼工作的重要意义。宫川先生认为有关西域的考察和研究，黄文弼的著作同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著作一样，应置诸座右。因此井上先生刻意访求黄文弼的著作，一老友闻知赠送了他一本《吐鲁番考古记》。井上先生虽自认对中文尚难达到透澈的了解，他以学者的睿智理解了黄文弼的著作有着赫定和斯坦因著作所不可取代的价值。当宫川先生突然逝世，井上先生继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他本着宫川先生的遗愿继续推动《黄文弼著作集》的日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田川先生把译完的《罗布淖尔考古记》手稿交给井上先生，井上先生作为小说《楼兰》的作者，以极大的兴趣，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读完，他感受到这部建立在坚实工作基础上的著作，对他多么有用。他认为黄文弼的著作会对日本的西域研究打开大而明亮的窗户。井上先生期望着继《罗布淖尔考古记》之后《吐鲁番考古记》以及以后各册能迅速出版。井上先生不幸于1991年去世，他留下了一篇值得珍视的序言。

第一册的日译者田川纯三先生在中国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八十年代他带领着日本NHK电视台《大黄河》摄制组，活跃在中国西北，对丝绸之路有了着迷的热情，再加上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从镜头上就可以看到他出东家串西家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为了了解丝绸之路探寻者的足迹，他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和丝绸之路的居民，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黄文弼这样一位丝绸之路考察先行者的业绩。他同许多日本人一样，曾读过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书，日本人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但对黄文弼却知之不多，甚至存在误解。当他读了黄文弼的书，觉得这位中国考古学家在自己的国土上的考古活动更值得重视，为此，他向宫川寅雄、井上靖等先生谈过自己的看法。当日译《黄文弼著作集》上马时，他自愿担当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的日译工作。田川纯三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赫定、斯坦因的许多著作都已经翻译成日语了，而黄文弼先生的著作尚未日译，我们一定要把黄文弼先生的著作翻译出版。”我想这几句话除了表述了一位日本学者的意愿和信心外，更感人的是他的公正态度和正义感。田川先生是一位勤于追求的学者，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正当他在讲坛施展才华时，出人意料的于1993年10月倒在和光大学的讲台上，因脑溢血逝世。

土居淑子教授承担了第二册和第四册的日译。第二册名虽为《吐鲁番考古记》，实际包括了中文本《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三部书，工作量很大，问题也比较复杂，土居教授为此耗费的精力也最大。

我与她见面是在1985年秋。当时刚上马数月的《著作集》由于宫川先生的急逝而暂告停顿，其间土居教授来华到山东考察汉画像石，路过北京，她通过史树青先生的介绍，由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安排，与我见面，我从而知道了有关编辑《著作集》的详情。她要求我为她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和协助。我义不容辞，从此土居教授与我保持了经常的书信往来。

土居教授是一位责任心很强，很勤奋的学者，不仅要译好这部书，而且要出好这部书。对于任何疑难点她都要穷追到底；对于书中插图版，她都力图弄到原底片或照片更换。寻

觅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陈旧资料，应该说是艰难的，但是大家会发现现在陶集和砖集很大部分的图版已较原书鲜明多了。本册的译稿在1988年即已基本完成，主要由于出版的原因被搁置下来。土居先生对此项工作却是一往情深，在此期间她又完成了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的翻译。其后又着手撰写《黄文弼与西域调查年表》，在此之前日本学者白须净真氏和我均出版过黄文弼著作目录和简单年谱。在此基础上，土居先生所撰增加了同时代国际西域考察者的活动及国际大事的内容，这就把黄文弼的西域考察活动置于国际的大环境中。最后土居教授又撰写了长篇译者后记，实际是一篇对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著作的详细评介，显示了译者的学术水平。还值得提到的是她根据第一手材料披露了二十年代中国爱国学者反对斯文赫定从北洋军阀那里获得无条件考察特权的斗争经过，最后达成维护国家权益的平等合作协议，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不了解这一点，对黄文弼与斯文赫定的关系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这一篇文章是在1994年8月完成，同月土居教授就与世长辞了，成了她的绝笔之作。在1993年底她曾写信告诉我，田川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并告知《吐鲁番考古记》将于1994年初出版。对于她的身体只提到有些不适，已入院治疗。我完全没有理会到，她竟是癌症在身了。而《后记》竟是在病情日益恶化的状况下在病床上完成的。弥留之际当告知她《吐鲁番考古记》付印的消息时，她面带微笑以微弱的声音说“终于完成了”。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她的人生句号竟与这部书紧密相连。

前田耕作教授在这部书中并没有挂上名义，但他却以饱满的热情和学术的智慧为这部书做了许多幕后工作，他是很有素养的中亚美术考古专家。他大力推动出版工作；他配合本书出版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特别是在宫川、井上两位先生去世后，他对这部书显得多么重要。

《黄文弼著作集》还只进行了一半工程，监修者、译者相继去世，前途似乎难测，但我仍信西域道路虽险阻，东瀛自有苦行僧。

1995年3月26日

之二：

日译本第一册（罗布淖尔考古记）寄语

1985年土居淑子教授来华访问时，告知田川纯三先生与土居淑子先生正在从事先父黄文弼著作的日译。这是由当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教授发起并直接领导的一项工作。不久宫川先生去世，田川、土居两先生本着宫川先生的遗愿，继续进行。当我得到这一信息，十分感动，我想先父在九泉下也会含笑首肯的。

黄文弼先生的主要著作，系有关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的考察与研究。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方与西文交通的枢纽，在经济、文化上的价值是勿庸多言的，从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出土的文化遗存上已充分显示出来。

从19世纪末，瑞典、英、法、德、俄、日本等国的探险家、学者曾接踵而至，涉足这一地区，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这些资料已大多陆续整理出版，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者从事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的研究，由此所引发的范围广泛的关注与兴趣，至今高涨不减。

在我国从西汉张骞出使，汉王朝的军事、政治影响达于西域，从此，西域为历代中国学者视野所及，从《史记》、《汉书》始，历代史书都把西域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记载，历代官吏、僧侣、旅行者记录西域见闻的亦不鲜见。

但是，近代意义的科学考察，应从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黄文弼是参加考察团的最早的五名中国学者之一，也是最先进入新疆专门从事考古的唯一中国学者。黄文弼先生最初一次的蒙古、新疆考古，从1927年至1930年，历时三年四个月，从此，黄先生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1933年，1943年，1957年又都到新疆进行考古，后三回的考察虽较第一次为短，但每次考察也起码在一年以上。

黄先生四次考古调查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了内蒙古与甘肃西部，特别是在新疆，北起阿勒泰、布尔津，南至和田，东起罗布淖尔，西至喀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仅踏遍绿洲地带，而且深入沙漠深处，横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调查遗址大小数百处，其中重点发掘过的有数十处。所获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为吐鲁番盆地、罗布淖尔地区以及塔里木盆地。

黄先生经过大范围的考察，写出了系列的考古报告。由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学问基础，结合实地考察所写出的几部巨著，其学术价值为其他单纯考察家所写报告难以企及。当然，当时的考察手段与技术远非今日所能比，其论断也受历史的局限，不一定尽皆妥当，但大部分内容至今仍不失其光辉。他的考察距今已有三分之二世纪，当时的遗址遗物历经沧桑之变，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已大为改观，他的记录作为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分外珍贵。

黄先生的几部著作印数都很少，在中国古旧书店早已消失无踪，即使在大图书馆也很难找到。此次由日本收编为《黄文弼著作集》译为日文出版，不仅大大便利了日本的研究者，对其他国家的学者也会有所帮助。我相信这一崇高的贡献，将会在学术研究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居、前田两位先生为了解决翻译中的问题，曾数度来中国访问，问题勿论大小都不肯轻易放过。其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我深为敬佩。这项工作得到了前田耕作教授的热心支持。由于恒文社诸先生的卓识远见和不懈努力，日文本的出版才最终得以实现。

田川先生曾对我说，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书都已译成日文，唯独黄文弼先生的没有，我们的愿望是想让黄文弼先生的著作同样有日译本。这一番肺腑之言，表达了日文学者真诚友好的感情。

现在，黄文弼著作的日译本已经问世，宫川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的丝绸之路路上写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我在这里对为此而尽力的文化使者和友好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8年9月25日 北京

之三:

日译本第二册《吐鲁番考古记》寄语

黄文弼先生于1928、1930年先后两次在吐鲁番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甚丰,其成果集结为《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和《吐鲁番考古记》三部书。在黄氏以前,外国人在吐鲁番从事考古发掘者并不乏人,由于他们以掠取古物为目的,所得虽不乏精品,但从考古学的意义来说,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黄氏本着科学考古的目的,按照当时所能达到的条件从事工作。《高昌陶集》中所见他在交河城雅尔湖墓葬区的发掘,严格按照茔区分布,有次序地进行工作,从他严密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沟北区沟西区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和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从而奠定了吐鲁番出土品分期的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伊兰文化和稍后汉文化的影响,为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汇提供了一批最可靠的实物说明。

《高昌砖集》的主要价值在于对高昌史的贡献。高昌王朝在西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王朝,在中国史书中虽有记载,但世系和官制都残缺不全。由于黄氏所获墓表一百二十余方,据以作《麹氏纪年》,对高昌麹氏王朝的世系和年代基本上得以弄清;《高昌国官制表》也把高昌王朝的官制理清了一个头绪。这对高昌史的研究,无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吐鲁番考古记》是黄氏在1953年完成的著作,在前两书所收录之外的全部资料都收入此书,因而内容丰富,多种多样。其中唐代及稍前的写本甚多,汉文写本中包括了古籍片断、各类牒、状、籍等,对研究高昌、西州社会、官府制度、经济文化等都很珍贵,还有大量绘画、泥塑、钱币等对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及艺术特色等亦属第一手资料。黄氏所作的考释和说明,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书中还有不少维文写本和印本,可供专家研究。这三部书构成了吐鲁番考古的较为完备的体系。

由前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教授发起日译黄文弼先生著作,这三部书由土居淑子教授担任。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严谨地进行,当我得知她一面喊眼痛,一面又奋力工作时,深受感动。前田耕作教授在百忙中为此书审稿。恒文社诸先生为出书尽力。日本朋友为这一崇高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和原作者的亲属,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并借此机会向读者致意。

1988年7月14日于北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仲高